

PROSPECTS

教育展望

国际比较教育

专栏

大屠杀教育的政策与实践：
国际的视角（第二卷）

特邀主编

E. DOYLE STEVICK & ZEHAVIT GROS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编

Vol. XXXX, no. 2, JUNE 2010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CNUP

上海市

出版

（上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展望. 154, 大屠杀教育的政策与实践: 国际的视角. 第2卷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编; 华东师范大学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7

(国际比较教育季刊)

ISBN 978-7-5675-1052-4

I. ①教… II. ①联…②华… III. ①教育—世界—丛刊
IV. ①G5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1337 号

教育展望

国际比较教育 总第 154 期

大屠杀教育的政策与实践: 国际的视角(第二卷)

编 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

译 者 华东师范大学

策划组稿 王 焰

项目编辑 王国红

审读编辑 邵亚芳

责任校对 高士吟

封面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8.25

字 数 173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1052-4/G·6735

定 价 32.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及材料,由作者自行负责,不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文章中所用名称及材料的编写方式并不意味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对于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于其边界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

一切信件请寄:

Editor, *Prospects*,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
P. O. Box 199,
1211 Geneva 20,
Switzerland.

欲了解国际教育局的计划、活动及出版物,请查询其互联网主页:

<http://www.ibe.unesco.org>

一切订阅刊物的来信请寄:

Springer,
P. O. Box 322,33 AH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中文版项目编辑:

王国红

合作出版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国际教育局(IBE)2009 年

P. O. Box 199,1211 Geneva 20,
Switzerland

and Springer,

P. O. Box 17,3300 AA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ISSN: 0033 - 1538

《教育展望》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Clementina Acedo

编委会成员

Norberto Bottani, Mark Bray

Kenneth King, Tatjana Koke

P. T. M. Marope, Mamadou Ndoeye

Fernando Reimers, Bikas C. Sanyal

Alejandro Tiana, Buddy J. Wentworth

Joseph Zajda, Yassen N. Zassoursky

Muju Zhu

助理主编

Simona Popa

助理编辑

Brigitte Deluermoz

中文版编委会

主 编

杜 越 陈 群

副主编

任友群 周南照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丰继平 王建磐 王斌华 冯大鸣

任友群 庄辉明 杜 越 杨光富

汪利兵 陆 靖 陈 群 范国睿

周南照 郑太年 郑燕祥 赵 健

赵中建 俞立中 祝智庭 彭利平

董建红 遇晓萍 程介明

编辑部主任

彭利平

副主任

丰继平(常务) 杨光富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展望》中文版编辑部

第 154 期

教育展望

国际比较教育

第 40 卷, 2010 年 6 月 第 2 期

中文版 2010 年第 2 期(总第 154 期)

目 录

编者按

关于大屠杀的教育:教育工作者面临的关键问题 *Clementina Acedo* 1

观点/争鸣

理解大屠杀: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一些问题 *Yehuda Bauer* 4

专栏/大屠杀教育的政策与实践:国际视角

导言——认识论与大屠杀教育:历史、记忆和知识政治
E. Doyle Stevick & Zehavit Gross 9

关注差距:德国大屠杀教育的教学目的与课堂互动
Wolfgang Meseth & Matthias Proske 21

遥不可及和近在咫尺:瑞士的大屠杀纪念和人权教育
Thomas Schlag & Oliver Wäckerlig 44

教育政策作为规范性话语与协商的意义:试论爱沙尼亚的大屠杀 *E. Doyle Stevick* 59

苏格兰大屠杀教育的政策与实践 *Paula Cowan & Henry Maitles* 78

评鉴大屠杀知识及其影响:加拿大的个案研究 *Jack Jedwab* 94

通过大屠杀教育的体验式学习项目培养公民领袖 *Carol Clyde* 109

编者按

关于大屠杀的教育：教育工作者面临的关键问题

Clementina Acedo*

在线出版时间：2010 年 7 月 9 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 2010 年

这是《教育展望》关于大屠杀教育双刊的第二期，本期继续反映作者们从实践和理论方面探讨大屠杀教育在促进人权、多元文化教育、和平教育及公民教育方面的意义。

本期开篇呈现了著名历史学家及大屠杀方面的学者 Yehuda Bauer 的有力观点。他坚持对问题进行辩论的立场，且通常是以含蓄的方式与其他学者进行对话，强烈反对在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之间画等号。Bauer 引用历史事实将大屠杀界定为“根植于纳粹种族灭绝政策中的最极端事件”，是绝不当重复的事件。

在《理解大屠杀：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一些问题》一文中，作者阐述了他的观点，这一主题间接地反映了大屠杀教育的复杂性，以及影响全球大屠杀教育政策与实践之关系的各种内在困难。本刊提出的关键问题涉及教师的大屠杀教育方法，包括“教育目的与课堂互动的关系”、“通过体验式学习培养公民领袖”、“大屠杀纪念日与人权教育”、“大屠杀教育中的积极价值和性别平等”、“大屠杀相关知识的评估”以及“在大屠杀意义的跨文化讨论中涉及的正义观念”等。

作者们还通过一些国际案例来阐述上述主题，这些国家包括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苏格兰、瑞士和美国。

Wolfgang Meseth 和 Matthias Proske 考察了如何在实践中开展关于德国纳粹历史这一“道德难题”的教学。通过四个案例研究，作者们揭示了教育目的与课堂互动之间的矛盾。他们发现，学校的组织框架和课堂互动的具体条件影响着对纳粹历史的教学处理。他们认为，学生接受知识的方式常常与预设的教学内容相互冲突，并与公众对于德国历史态度的期待相冲突。文章强调，把历史教学的质量与在具体课堂情境下利用机会表达自我的能力结合起来是非常重要的。

* 原文语言：英语

Clementina Acedo

通信地址：UNESCO IBE, P. O. Box 199, 1211 Geneva 20, Switzerland

电子信箱：c.acedo@ibe.unesco.org；s.popa@unesco.org

Carol Clyde 分析了参与大屠杀教育的体验式学习项目对培养大学生世界观和公民领导力的影响。波兰之旅项目的目的是提高项目参与者的能力,并让他们参与公民领导力活动,以减少并最终防止今后的人权暴力。她的研究表明,体验式学习项目的确可以对大学生产生影响,而这在倚重教材和讲授的传统教育方法中可能是难以实现的。

Paula Cowan 和 Henry Maitles 分析了近十年来苏格兰的国家课程改革、大屠杀纪念日活动的实施以及来自奥斯维辛项目的教训对大屠杀教育发展的影响。作者们的结论是,上述三项行动计划的实施应该是可持续的,尤其是通过政府的持续支持,以维持大屠杀及种族灭绝教育在苏格兰的较高影响力。

Thomas Schlag 和 Oliver Wäckerlig 认为,尽管瑞士人民既没有被深深卷入二次大战的硝烟中,也没有遭受大屠杀的残酷之痛,但大屠杀教育和人权教育应该成为瑞士教育政策的重要基础。这将激励教师、学生及整个社会更多地了解欧洲历史,如瑞士是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使它们成为更好的公民,并对人权、包容和民主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和敏感性。

Jack Jedwab 分析了约 1500 名加拿大人对一项公众民意调查的问卷回答,调查涉及大屠杀知识、对种族灭绝的认识以及对歧视和多样性的态度。他的研究表明,拥有更多的大屠杀知识,与对种族灭绝的关注和认为反犹主义是一个社会问题之间有着很大的相关性。但是,拥有更多的大屠杀知识与对多样性的更开放态度之间没有一致性关系。据此,作者认为,需要更多地研究上述两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更深入地考察学生对多样性的认识以及大屠杀教育在这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最后,作者进一步阐述了大屠杀教育的全球评估标准,因为这涉及多元文化教育和公民教育。

Doyle Stevick 试图解释爱沙尼亚的大屠杀教育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以及为何各种促进变革的国外的努力大都是无效的。在他看来,这些结果与国际社会控告纳粹战犯的背景以及爱沙尼亚加入欧盟后正在变化的地缘政治有着密切关系。Stevick 认为,新的形势让爱沙尼亚和其他中东欧国家“改变其对大屠杀教育的立场,从巧妙地抵制国外压力转向积极向欧洲的学生宣传有关二战的另一视角”。

上述文章涉及不同的主题,且运用了实践研究与反思相结合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两期专刊迥然不同的特点。然而,两期专刊中的所有文章也具有一致性,各篇文章及其所分析的主题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尤为重要的是,本刊的特邀编辑和各位作者的精辟阐述,深刻地澄清了诸如公民权、多样性、人权、道德、和平以及纪念日等观念与大屠杀教育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发展的。

相关主题及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证实了大屠杀教育的复杂性——这是一个很少被涉猎的崭新领域,处于教育、历史、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地带。我

想再次强调,为了实现和平、多样性和尊重他人的目的,持续开展关于大屠杀教育的政策与实践的对话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学会如何成为更好的公民和学会做人的一种途径。

致谢 特别感谢 Simona Popa 为本编者按的撰写所给予的大力支持。

(丰继平 译)

理解大屠杀：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一些问题

Yehuda Bauer*

在线出版时间：2009 年 10 月 21 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 2009 年

关于大屠杀的教育面临着非常棘手的问题。许多民众及其政府中正在形成一种共识，即纳粹德国及其帮凶实施的犹太人种族灭绝是迄今最极端的种族灭绝形式，而且有重演的危险——不是以完全相同的形式，而是以相似的形式，这是一个很严峻的全球性问题。与此同时，否认犹太人种族灭绝的情况也很猖獗。在西方，公然的否认尚不明显，但在很多其他国家，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意识形态。对于伊朗总统来说，大屠杀是一个“大谎言”（*Der Spiegel*, May 29, 2006）。在埃及，2002 年 12 月，穆巴拉克总统的首席顾问 Osama el-Baz 不得不在一系列相关文章中驳斥埃及媒体中出现的言辞激烈的反犹太人的长篇大论，包括否认大屠杀。在很多情况下，大屠杀没有被否认，而是被人赞颂，有人承诺下一次大屠杀会比纳粹德国实施的更漂亮（2009 年 1 月尤素夫·卡拉达维在半岛电视台的讲话）。此外，还有一种软否认，尤其是在欧洲，有人基于一些肤浅的比较或把大屠杀纳入一般性陈述中，从而将犹太人种族灭绝等同于同期发生的其他事件。

有理由对以下各种企图表示忧虑：将纳粹政权的种族灭绝政策一般性地等同于在其中心实施的大屠杀，等同于其他的谋杀行为或暴行，这种等同不仅相应地淡化了纳粹政权犯下的犹太人种族灭绝罪行，而且是对世界近代史的捏造和篡改。因此，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2009 年 4 月 2 日），决定将 8 月 23 日即纳粹德国和苏联在 1939 年的这一天签署臭名昭著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日子，作为纳粹政权被害者的纪念日。为了谋求政治上的正当性，犹太人大屠杀显然被排除在这一比较之外。

1940 年至 1941 年以及 1944 年至 1989 年/1991 年期间，在被苏联占领的波罗的

* 原文语言：英语

Yehuda Bauer（以色列）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大屠杀研究的教授、犹太人殉难博物馆（Yad Vashem）的学术顾问、以色列科学院成员。他撰写了 14 部著作和 90 篇有关大屠杀的文章。

通讯地址：Research Institute Yad Vashem, P. O. Box 347, 91034 Jerusalem, Israel

电子信箱：bauer1926@yahoo.com

海国家中，数以万计的当地人被流放，其中有很多人死亡，大部分在很晚的时候才回国，他们身心俱伤；此外，有数千人被关押，或在狱中被杀害或死于狱中。为数众多的当地统治者盲目听从莫斯科的命令，不过他们没有制定种族灭绝计划，即灭绝东欧各民族的行动。例如，在波罗的海国家被流放、受折磨以及被杀害的人群中，犹太人所占的比例较大。这是残忍的谋杀性压迫，但它既不是针对犹太人，也不是针对其他民族的种族灭绝。同样必须说，那些在战后立即被处死的人中，有一部分的确是纳粹的帮凶。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波兰、前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东欧所谓的“人民共和国”。这些国家的政权阻止真正的现代化，杀死了数以千计的人；他们压制各种自由言论，并扼杀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毫无疑问，对于全欧洲来说，的确有必要纪念这些被害者。但是，将此等同于纳粹政权对数千万欧洲人所实施的谋杀，那是对历史的歪曲。此外，如果要同等地纪念所有被害者，排除死于大屠杀中的犹太人，则会毫无意义；尽管有相反的观点，但他们毫无疑问必须被纳入在内。

应该记住，由纳粹德国在 1941 年至 1943 年间提出的所谓“东方总计划”（Generalplan Ost）制定了“这般”的种族灭绝计划——借用 1948 年联合国种族灭绝公约中的术语——通过强制性的德国化（即把他们变成德国人，将他们纳入优等民族，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让这些民族消失），灭绝三个波罗的海民族、波兰人和捷克人。那些不被德国化的人，将在德国胜利后、在犹太人全部灭绝后被驱逐或杀害；当然，德国的战后计划不为后来的被害者所知。另一方面，犹太人与所有其他人不同——他们所有人——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世界各地都将被灭绝（这方面的证据很多）。

在此我想提出的观点是基于拉脱维亚历史学会撰写的关于苏联在拉脱维亚的错误行为的官方英文报告[《苏联和纳粹占领下的被掩盖和被禁止的拉脱维亚历史（1940—1991）——拉脱维亚历史学会的研究》，拉脱维亚历史研究所，第 14 卷，2005 年，里加]。我之所以选择拉脱维亚，因为它是一个民主国家，它通过令人钦佩的非暴力反抗赢得了独立，从而证明了其自身的民主性。

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在战前处于两个相邻的超级大国——纳粹德国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的统治之下。在拉脱维亚，传统上就有人反对德国人。德国的贵族对拉脱维亚实行了几个世纪的统治和压迫。拉脱维亚共产主义者是推动布尔什维克党于 1917 年掌权的中坚力量；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独立的拉脱维亚惧怕苏联，他们之前建立了一个自由政府，但后来变成了一个由 Karlis Ulmanis 统治的国家（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发展也很相似，到 1930 年代成了独裁统治国家，分别由 Antanas Smetona 和 Konstantin Pāts 统治）。在拉脱维亚，有本土的亲纳粹分子和亲苏联团体，他们反对 Ulmanis 政权。1939 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拉脱维亚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必须承认，拉脱维亚共产主义者在当地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而且有些农民起初是欢迎由共产主义者实行的土地分配的。但当时存在着民族压迫和政治迫害，所以在 1941 年 6 月德国入侵之前，残酷的西伯利亚驱逐事件发生了。因此，当德国

人在 1941 年进攻时,大多数拉脱维亚人——就像他们的波罗的海邻国一样,但与波兰和捷克不同——站在德国人一边。德国人并不像很多人所期望的那样给予自治权,也从没想让拉脱维亚独立。尽管如此,德国人却被视为救世主;在立陶宛,尤其是在拉脱维亚,有大批人共同参与了犹太人的迫害和谋杀。在德国人的指挥下,当地的大多数犹太人被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杀害。德国人招募了一些波罗的海的警察,包括拉脱维亚的警察,他们是德国恐怖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白俄罗斯,甚至在波兰和乌克兰屠杀犹太人。但是,波罗的海警察的参与并没有改变德国对包括拉脱维亚在内的波罗的海民族的殖民政策;也没有在犹太人基本上被歼灭之后,通过战争后期的征兵建立拉脱维亚党卫军。从事谋杀活动的拉脱维亚警察部队也成为党卫军的一部分。

后来,拉脱维亚反对派组织得以发展,但他们没有通过暴力与德国人进行斗争。在苏联支持者和波罗的海共产党人领导下的苏联人赢得了一些支持。当苏联人再次回到拉脱维亚时,拉脱维亚红军成立了,因为在苏联国内有相当数量的拉脱维亚侨民,而且其中有很多是苏联政权的支持者。苏联第一次占领拉脱维亚持续了一年的时间(1940 年至 1941 年),而第二次占领的时间却持续了 45 年,直到苏联解体。

在苏联占领时期,拉脱维亚的国家历史被改变;拉脱维亚的文化机构被改变成舆论宣传工具。但是,拉脱维亚的语言未被禁止,拉脱维亚民族传统的外壳得以保存。希伯来语被禁止,后来还成功压制了依地语。拉脱维亚的机构被改变,犹太人的机构被撤销。大量非拉脱维亚人进入拉脱维亚——其目的是不是直接摧垮拉脱维亚民族,现在仍不清楚。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压制,但绝对不是种族灭绝。如果是种族灭绝,那就不会有最终争取独立的机会,即在苏联解体之后才实现的民族独立。拉脱维亚的民主党人以解放捷克的“天鹅绒革命”的方式解放了拉脱维亚,可以说,这是令人钦佩的。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同样的事件:残酷的压迫、否认人权、杀害真正或假想的政治敌人——这是对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这是不对的。

回到拉脱维亚,有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大量拉脱维亚人与德国人合作,未必是出于对纳粹德国的同情,而是对第一次占领的痛恨,以及对革命前反沙皇政权的历史记忆,沙皇政权的部分政策被苏联延续。它同样导致了大批当地人积极参与对犹太人的残杀或持默认态度。1939 年之前的反犹太主义也不容忽视。第二个问题同样很严重,关于苏联在反纳粹德国战争中的历史性作用,波罗的海人对历史的认识与中西欧人对历史的认识是不一致的。对此不可等闲视之。在波罗的海人的心中,苏联的威胁一直挥之不去,这或许非常自然,因而导致把斯大林主义等同于纳粹主义。但从历史上看,这是错误的。

当前饱受争议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对犹太人的指控,他们曾在 1939 年至 1941 年间与可恨的苏联人合作(这忽略了大量非犹太人与苏联人的合作)。这种指控不仅普遍存在于波罗的海国家,还存在于波兰和罗马尼亚。其背景是,在两次世界大战

中,在所有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政权(捷克斯洛伐克除外)中,犹太人显然是一个外来民族,他们无权进入任何军事或非军事机构中任职。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这些国家中的任何国家都没有犹太族的政府官员或军官——当然更不会有高官,犹太将军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西欧的情况也是如此,而澳大利亚的情况不同,例如在一战期间,澳大利亚的军队是由犹太裔将军 John Monash 指挥的)。当苏联人到来时,一些犹太人成了政府官员。与犹太官员打交道的念头让人深感愤懑。犹太人担任这些职位的实际人数非常有限,因为苏联人尽可能聘用可靠的占多数人口的民族群体。由于苏联人不信任犹太人,犹太文化逐渐被根除。国家的管理由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负责,加上少数其他种族的成员,如高加索人、犹太人及其他人。在安全机构以及其他部门也是如此。但是,只要有一个犹太人任职,就足以引起公众的强烈愤怒。当然也足以确保除了极少数人之外,本地的波罗的海人不会去帮助犹太人,而大多数人将会积极或消极地参与到大屠杀中。在波兰的民族地区,不同地区的人们持不同态度。只是在波兰东北部的一个地方,有人积极参与针对犹太人的谋杀。

纳粹德国对全人类的威胁更大,而解放东欧的是苏联军队,这是击败纳粹德国的核心力量。事实上,苏联拯救了波罗的海国家、波兰、乌克兰、捷克和其他国家,使它们摆脱了纳粹对这些民族实施的蓄意的种族灭绝,其目的并不像对犹太人那样将整个种族灭杀,而是使得这些民族就此消失。欧盟的声明潜在地把纳粹德国和苏联直接等同起来,因而提供的是一个扭曲的历史画面。

这一声明还隐含着战争是由两个政权同时发起的,因此他们必须对欧洲约 3500 万人的死亡负责(据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如果加上亚洲战争的死亡人数,总数约为 5500 万)。这是对历史的全面歪曲。1939 年夏,为确保德国不进攻苏联,斯大林愿意付出一切。因为他深知,他的军队已经无力单独去经受一场德国人的猛攻。到 1939 年 6 月,他还试图争取与英法形成统一战线以抗击纳粹德国。但是,西方各大国明确表示,它们在任何共同行动中的投入都有严格的限制,谈判由此终止。波兰断然拒绝了苏联——这是对的,试想——如果那样的话,苏联军队将穿过其国土向德国进军。英国告诉苏联,他们可以派出两个团的兵力,以后再增加更多兵力。法国的暗示很明确,他们将在马奇诺防线后保卫自己。苏联别无选择便只好寻求与希特勒方面的妥协,尤其是如果他们能够获得领土上的收益,并在西边建立新的缓冲地带。

二次大战是由纳粹德国而非苏联发起的,3500 万欧洲人的死亡(其中 2900 万为非犹太人)的责任应由纳粹德国来承担,而不是斯大林。至于对被害者的纪念,如果认为这两个政权应承担同等的责任,那是对历史的歪曲。

种族主义、恐怖主义、反犹太思想与纳粹社会的建构有着可怕的一致性。纳粹没有内在的矛盾:通过战争和政府来控制世界,种族灭绝计划是该政权的标志。没有军队的溃败,就不会有希特勒政权的消失,它决不会自行垮台。

因此,不难看出,苏联最终能够与西方合作打败纳粹德国。苏联曾经是一个普

通国家,被一种与实际生活毫无联系的思想所美化,使用了异常方法来反对真正的和假想的敌人。当然,2000 多万苏联公民死于战争中,是因为苏联红军击败了纳粹德国,尽管西方也提供了支持。苏联士兵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事实上,他们是这么做的,因为如果他们不作出牺牲的话,纳粹德国就不会活着离开东欧国家,并在二战之后重建自己的国家。如果今天东欧人能够享受欧盟的成员国待遇,这是因为他们被苏联政权而不是被纳粹统治了 45 年之久。西方人认识到,而事实上很多东欧人也这样认为:他们要消灭纳粹,以便开始一条曲折艰难的道路。苏联红军帮助他们打败了纳粹,尽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就是一种矛盾。东欧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那是当之无愧的。但我们不要因此而改变历史。

人们当然应该记住纳粹政权的受害者,而且有充分的理由为此确定特殊的纪念日。但是,把纳粹和苏联两个政权置于同一层面,在同一场合纪念不同的罪行,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纳粹大屠杀史无前例,但它不是唯一的。这是一个极端的案例。根植于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这种政策本可以吞噬那些今天支持把希特勒和斯大林等同起来的人。他们可以提出这种歪曲的历史观,但他们错了:他们活了下来,是因为没有这种等同。

(丰继平 译)

导言——认识论与大屠杀教育: 历史、记忆和知识政治

E. Doyle Stevick & Zehavit Gross*

在线出版时间:2010年7月22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 2010年

摘要:本文将探讨有关大屠杀教育的知识政治和认识论的问题。文章认为,因为知识不是中性的,所以在教科书、教学过程和媒体中,我们必须重视意识形态在选择和呈现大屠杀知识方面的作用。课堂上关于大屠杀知识的建构,是所有人的文化、观点和经验发挥作用的意义建构的关系过程。基于这些原因,作者认为,应该根据其他基本问题来思考大屠杀教育,包括历史、记忆和认同之间的关系,从而了解其在培养民主公民过程中的实际和潜在作用。

关键词:大屠杀教育 认识论 历史

* 原文语言:英语

注:特邀编辑要感谢 Simona Popa 和其他评审员为所有作品进行的修订,这个项目从头到尾花费了数百封邮件和数百个小时;感谢 Brigitte Deluermoz 整理手稿;感谢 Clementina Acedo 支持这个项目;还要感谢几十个评审员们花了数百个小时仔细审查和改善这些投稿,不管是最终采纳还是没有采纳的投稿,每一份都是手写稿。

E. Doyle Stevick(美国)

南卡罗来纳大学教育领导和政策领域的副教授,他在该大学创建并管理着国际与比较教育中心。2001年9月至2004年12月期间,他作为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在爱沙尼亚研究教育民主,爱沙尼亚的大屠杀教育政策是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而出现的。他与 Bradley A. U. Levinson 共同主编了《重塑公民教育:如何通过教育形成多元化社会中的民主公民和推进民主?美国的国际影响和国内实践》。他和 Deborah Michaels 正在合力完成一本关于发生最多杀戮的地区——中东欧国家的大屠杀教育的书。

通讯地址:Colleg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318 Wardlaw Hall, Columbia, SC 29208, USA

电子信箱:stevick@mailbox.sc.edu

Zehavit Gross(以色列)

是一名高级讲师,并且是以色列巴伊兰大学非正规教育系统管理与发展部门的研究生项目负责人。她的主要专业领域是青少年社会化进程(宗教、世俗、女性和公民)。目前她正积极参与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的四个国际项目。

通讯地址:School of Education, Bar-Ilan University, Ramat-Gan, Israel

电子信箱:grossz@mail.biu.ac.il

本文旨在分析认识论在大屠杀教育研究中的作用。认识论所讨论的问题包括知识是什么、知识的价值、知识的来源、知识的不同类型,以及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或知识的界限是什么(Wiersma & Jurs 2009)。我们认为大屠杀教育可以作为公民教育的一个支柱,大屠杀的教学和学习应该融入认识论的问题和含义。

知 识 政 治

应该教授大屠杀,这点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决定讲授大屠杀的何种内容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问题比比皆是:应在社会化过程中传播什么知识?应该在什么时候教授?在哪个年龄组教授以及如何教授?仅仅在课堂的正规课程内,还是也包括户外活动?在博物馆?通过去波兰旅行?应该由谁来进行大屠杀教育?对该教授什么这一问题的标准回答,会因为目的和背景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但这却是实践者迫切关注的问题。迫切要求研究者回答在不同环境下应该教授什么、为什么教授、有何影响等实证问题。

尽管上述问题至关重要(Gross 2008),但一些关键的相关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这些问题涉及认识论和知识政治。阿普尔(2010, p. 152)认为,学校是“筛选、保存和传递能力概念、思想规范和价值观的机制,而且往往只限于某些群体的‘知识’”。大屠杀教育尤其体现了这些问题:“传递了或忽略了谁的知识,教师和学生不同的环境中是怎样建构和运用大屠杀教育的?”(Gross 2008)。

20 世纪 70 年代初,包括福柯、布迪厄和伯恩斯坦在内的学者有力地促进了对知识在教育领域中作用的理解。1971 年,Young 的划时代著作《知识与控制:教育社会学新探》提到了学校知识的四个方面:课程、教师的知识、教材和教学法知识,以及相关学生的知识。他写这本书的前提是:每个教育行为或呈现在学生面前的课文都是一种经过选择和组织的社会活动,在特定时间里有意或无意地构建可用的知识。知识的选择和组织由那些有权势的人执行,他们决定什么是知识和什么知识是有价值的,由此来加强和赋权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特殊要求。该呈现什么知识和如何呈现,这需要进行社会学探究。

知识不是中性的,知识的分配也不是一个中立的过程。一个事实、一种知识的价值并不是绝对的,它的意义来自于社会主导的或边缘的意识形态,是学校中人与人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而重新建构的。那些选择这方面知识的人相信它可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并巩固他们的社会地位。每一个教育决策本身就是意识形态(阿普尔 2004)。因此,学校应该要警惕知识是客观或中性的观念。知识是有意且取决于环境的。知识呈现的方式、人们阐述知识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广泛的个人或社会因素,反映了一定的利益和意图。正如阿普尔(2010)认为的,教育应该被视为一种政治行为,并加以研究。他声称,“我们需要有联系的思考……我们需要将教育放

置于更大的社会权力不平等关系和支配与从属的现实,以及在这些关系所产生的冲突当中来认识教育”(p. 152)。鉴于这种论断,我们也许会问:学生们所接受的知识性质是什么?知识是客观的,还是一种通过我们个人的镜头进行解读的主观建构?阿普尔(2010)通过质疑知识是如何成为官方的知识,从而扩大了这一问题的范围,而不仅仅局限于“这是谁的知识?”:

这种知识本身与教和评估它的方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谁在这个社会中有文化、社会和经济的资本?谁从这些合法化的知识定义和学校教育及这个社会的组织方式中获益,谁又不能获益呢?如何使那些通常的改革实际有效呢?作为重要的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员和支持者,我们如何改变现有的教育和社会不平等现象,并创建更具社会公正性的课程和教学呢?

阿普尔关于“谁的知识”这一问题对大屠杀教育的内容与合法性方面特别重要,上百万的死难者以及铁幕背后的那些幸存者——已经无法分享他们的故事,这些事实使得大屠杀的历史和记忆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教科书和课程知识的构造、合法性及选择,有助于创造一种环境,使教师在与课堂中的孩子们进行对话时进一步选择和解释材料,也有助于创造一个他们共同建构和协商意义的社会文化过程。这种创造意义的关系过程,必须在他们经历的环境中按照其复杂的相互关系来进行理解,通过上述讨论的一些过程,按照一些重要的方式来建构概念。共同建构意义的关系过程必须了解所涉及的文化,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考虑意识形态,但不仅限于此。

Alon Confino(2005)就大屠杀本身说明了这一点,并指出“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关于灭绝犹太人的解释性框架是强调在二战的残酷情境下激励德国人的纳粹种族意识形态”(p. 297)。我们必须“更仔细地审查纳粹价值观和信仰的文化因素”,因为“纳粹迫害和灭绝犹太人的主要解释是……纳粹如何创造一个文化表征和社会实践的世界,他们的信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p. 298)。

为了将这个概念的重点缩小至当代有关大屠杀的教育问题,而不是关于大屠杀本身,我们必须超越意识形态而转向文化,考虑文化过程如何影响一些环境背景,使学生可以在他们的课堂或其他教育环境中,通过与合理的意识形态进行互动,从而得出意义。这些文化调查与思考的关注焦点必须是记忆本身的作用。

记忆和历史

大屠杀教育的一个重要挑战是简化历史的倾向。大屠杀幸存者 Primo Levi (1988)声称,在大屠杀的历史方面,我们的主要困难是试图了解他所说的“灰色地

带”。他在一篇文章中专门分析了“灰色地带”，认为“我们……往往容易简化历史，但并不一定会按照一种单一明确的方式去认识事件发生的模式。因此，不同的历史学家彼此之间可能会出现不一致的理解和诠释历史的方式”(p. 22)。

过度简化的倾向，是大屠杀教育的根本问题。这说明我们没有能力解决知识的性质，也不知如何运用和概念化知识。我们不能通过记忆的灌输来简单地谈论一份记忆或一个真相。相反，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所谓的官方和客观的历史记载)和记忆(个人的解释和传递的经验)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它们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白俄罗斯的情况说明了历史和记忆的一些复杂关系：

1941年至1944年，德国军队通过饿死苏联战俘，枪杀和用毒气毒死犹太人，并枪杀参加反党行动的平民，使白俄罗斯成为世界上最惨无人道的地方。白俄罗斯一半的人口，要么在二战期间被杀害，要么被迫流离失所。这在欧洲的其他国家是绝无仅有的。

关于白俄罗斯这段经历的记忆……，有助于解释西方对各种行动计划的怀疑。西欧人一般会奇怪，为什么俄罗斯是欧洲大规模屠杀的中心和反纳粹游击队的行动基地——游击队实际上曾为盟军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令人吃惊的是，这样一个国家竟可以完全消失在欧洲人的记忆中。对历史的讨论缺少了白俄罗斯，这是记忆和历史之间差异的最明显的反映(Snyder 2009)。

某些方面的记忆/历史的挑战有比较明确的解释，尤其是在不自由的社会。一般来说，苏联阵营禁止自由的历史探究。苏联存在大屠杀的知识，有关于它的出版物，甚至承认地方的同谋(如波罗的海国家)，但出版物一般都是用意第绪语(Rohdewald 2008, p. 173)，只有爱沙尼亚是一个例外(Gitelman 1990, p. 28)。除了压制历史探究，在苏联对战争的宣传中，通称大屠杀中的犹太死难者为法西斯死难者的苏联公民(他们在战争早期阶段所接管的民族，也称苏联公民)。

此外，苏联断绝与西方国家的自由交往，在有关大屠杀的知识方面造成了两个明显的后果。在苏联领导下的国家，往往没有获得涉及西欧、以色列、美国及其他更远地方的大屠杀的历史认识。其次，来自东部的大屠杀幸存者没有自由地分享他们的经历，这限制了西方了解 Anne Frank 或其他阵营外国家的大屠杀幸存者的故事(Snyder 2009)。Snyder 认为，大屠杀真正的地理中心应该进一步转向东部，包括未被同化的说意第绪语的东欧正统的犹太人。那些在 1989 年至 1991 年期间获得自由的国家一直努力将自己纳入欧洲(Michaels & Stevick 2009)，它们的假想边界由于战后地缘政治的原因而遭到收缩。

在这些情况下，对战争更广泛地了解仅限于私人家族的记忆，从局限的民族视角来建构，从而起到反对(非法)国家宣传的堡垒作用。出于很多原因，苏联非法的

政治粉饰和腐败，阻碍了努力研究地方大屠杀历史的工作。也许最重要的事实是：尽管苏军解放了许多营地，记载了许多暴行，并控诉了一些最令人震惊的大屠杀罪犯，然而，它们出于政治目的滥用刑事司法系统，致使许多生活在苏联的占领或霸权下的人们（意识到逼供或诱因谴责）开始怀疑他们曾经收集的证据（Weiss-Wendt 2008）。这种阻碍记忆和历史协调进步的障碍，加剧了俄罗斯当局继续禁止研究人员自由研究苏联档案的工作。

这些态势造成了一种情况。历史通过学校来揭示，记忆在相当大程度上起到的是反面作用。不同文化的独特历史在记忆的取向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Rohdewald(2008)比较了俄罗斯、乌克兰和立陶宛的记忆轨迹，并发现了三种不同的方式，“立陶宛完全谴责其共产主义的过去（中东欧），乌克兰在该问题上有分歧，而俄罗斯则不提及此方面（狭义上的东欧）”（p. 174）。此外，他指出，作为苏联时期少数积极事件之一，俄罗斯取得反纳粹胜利这一纪念事件并没有受到大屠杀的影响，大屠杀仍然处于第二考虑事件，尽管阴谋理论家往往表示犹太人是俄罗斯大屠杀发生的原因（p. 175）。早些年前，乌克兰遭受了由苏联导致的饥荒，按照一种新的观点，“L. Deshchynskyi 将‘乌克兰大饥荒’和大屠杀描述为单方面的‘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乌克兰民众是‘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死难者，而忽略了乌克兰人在这两种环境下的合作”（p. 177）。Rohdewald 还说明了立陶宛避免一般合作的话题，同时“立陶宛的种族灭绝正被大屠杀的例子概念化”。还有一个真实情况是：“（犹太人的）大屠杀既不被看作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悲剧，也不被认为是作为立陶宛公民的犹太人，即立陶宛人的灾难。在这里，它仅仅代表了按一定顺序和大屠杀一起反对立陶宛民族和其他国家的事件。”（p. 180）

这些差异对在这种思维方式中长大的该地区的教育工作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影响了那些希望和当地大屠杀教育工作者一起共事的外人。如果不出意外，似乎人们仍愿意选择苏联和纳粹的立场。大多数人必然会反对确定给他们带来最多伤害的政权，而不是确认那些政权各自与众不同的恐怖之处。毕竟，陷入苏联和纳粹之间的人们很少有机会选择有积极的一面并坚定地支持，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显眼的黑色和白色描述，反而通常是黑暗的描述，这样的现实需要一种灰色的认识。

欧洲青少年正面临着有争议的记忆（Gross 2009）。一方面，欧洲是自由主义和自由的中心。另一方面，在 20 世纪，欧洲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地方。青少年怎样才能同时应对阴影和荣耀（Van der Tuin 2009）？Judt(2005)认为，遗忘是欧洲人在二战后试图重建欧洲所采用的主要策略。这是必要的，因为纳粹政权期间，许多欧洲人参与了暴行。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他们开始建构一种“净化”的记忆，以重建一个新的欧洲身份和文化。欧洲有许多博物馆、纪念馆和文物，尽一切努力去处理那些痛苦和消极的回忆。为了使欧洲继续生存和重建其独特的身份，有必要记住或忘记某些事情。谁控制这些集体和个人遗忘或纪念的过程呢？他们是为谁的利益服务，人